

纪念|资讯

◀ (上接3版)

我们把它翻译为“新儒学”。但是就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不久,田浩(Hoyt Tillman)教授提出用“道学”替代“理学”以及 Neo-Confucianism 的主张。本来这是程朱学术(一般称为理学)与更为广泛的宋代儒学者的思想及事工间的关系问题;在田浩看来,理学家其实与宋人自称的道学家应该一视同仁,都一体称为道学比较合宜。

田浩的主张与 Neo-Confucianism 的用法因此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用 Neo-Confucianism 这个名词的人是合理学与道学为相通的同一个思想潮流来说的,因此如果专就宋朝而言,它与“道学”当然也可以相通。但是田浩教授认为既然中国人有这么一个现成的名词,那使用它就是。对田浩的说法,狄培理则认为 Neo-Confucianism 可以适用于明清的儒学,而“道学”就显得略逊一筹。他认为明清时代,不管是理学或心学,两者至少在思想上有内在的关联性,因此通用 Neo-Confucianism 是讲得通的,而“道学”就缺乏这个优点。事实上,在英文学界,“道学”也已经被用来单指程朱的“理学”了。狄培理在 1981 年出版的《道学与心学》就是用“道学”来指程朱的正统。它指的正是我们一般称之为“理学”的思想传统。因此笼统使用“道学”来称明清儒学思想会引发混淆。

这里不就这个争论做进一步的探讨,因为我的目的是简述这 30 年来狄培理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做是非优劣的分梳。何况这个争论说起来还是一个属于第二层次的学术课题。但是在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就是在

狄培理的心中,黄宗羲正是最足以代表这个有包容性特质的 Neo-Confucianism 思想潮流。

那么,Neo-Confucianism 是不是应该继续翻译为新儒学?这不幸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大约就在狄培理来香港演讲的同时,“新儒学”这个名词却开始被许多人用来称呼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以降的一系列恢复儒学的思想潮流。于是用“新儒学”来翻译 Neo-Confucianism 近来又产生另一层的纷扰。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狄培理先生,希望知道他的看法。不过很可惜,当时我们推敲一番之后,竟然没有结论。以我个人的看法,用“宋明儒学”来翻译 Neo-Confucianism 或许是可行之道。

近 30 年来,狄培理先生转而关心教育[特别是所谓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其实他主张应该推动的是“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或中古欧洲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和课程。在他看来,教育最应该追求的是他一生关心的内敛自得的自我发展境界。就严谨的学术作品言之,《宋明儒学教育:形成的阶段》(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1989)最足以代表他的努力。而代表他对教育的成熟思想的则是《高贵与文雅:亚洲的领导与公共幸福的理想》(Nobility and Civility: Asian Ideals of Leadership and the Common Good, 2004)一书以及他近年来继续推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这些书都反映了上述中国传统的教育信念。

从 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



狄培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工作近 70 年

解释一贯地着眼于个人的自得、自发,以及道德涵养所可以带来的解放成圣的内在功夫。他认为这样的思想传统可以与西方藉由社会的积极性努力来保障个体发展的想法相互补充。他又认为中国的“道统”观念会继续对世界文明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西方教育应该积极地从中国这一传统中汲取精神来替自由教育补充养分,作为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

有一次在研讨会课堂上,他提到了莫顿(Thomas Merton)。他说,莫顿与他同是天主教徒,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他说他们两人当时都在努力追求人生的理想和可以依归的真理。后来莫顿在天主教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变成了非常有影响力的修道士思想家,而他自己则在宋明儒学中找到了有意义人生的方向。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一个真诚的表白。但是狄培理先生终其一生也保持他的天主教信仰。他在哥伦比亚的办公室离校内的圣保罗教堂很近,经常会在中午休息时,去那里祷告。旅行在外,他们夫妇也一定会去找可以弥撒的地方。对他来说,东西文明最高的极致必然是一贯而无间的。通过宗教性的感受,一定会达到畅通无阻的圆融。有时候,我真是觉得他对东西文化的阐述和憧憬甚至胜过许多中国学者们所斤斤计较的学统和它们所衍生的我执。无论如何,两位哲人的人生都充满值得我们学习或反思的经验。

在结束这一段对狄培理过去 30 余年的心路历程之前,我应该也讨论一下我个人对这本书的意见。坦白地说,我个人对于狄培理先生的努力感到非常钦佩,对他的观点也不是没有保留。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本来是政治性或社会性的,指向的是大公的天下,但是狄先生把他对建构理想世界的想法与他的“自家体贴出来”的求道方式连接在一起,并且认为这样的功夫不仅能合道学与

心学之异,也认为这就是达致个人发展境界的根本。这个说法相当引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留有一个问题:个人发展的理想和相关的道德探索应当胜过或先于肇制法律规范的社会性事工。这个问题本来是近世以来西方思想家左右寻觅的窘局。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是付之阙如的,没有把道德的相关探索拿来与黄宗羲天下为公的制度性思考结合在一起。因此狄先生的意见似乎还是西方的本位探索,而在这样的过程中,显出他对所谓“消极的自由”的不耐。我认为这个跟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或许有关系。在天主教或基督教的神学里面,自由和真理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如果能与信仰的对象(基督)合一,那么他就会得到自由。这个说法其实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非常相同。不过,如果黄宗羲的书未能如同卢梭那样提出一样深奥的自由理念,至少他却真诚地要在现实的世界里,找到一些明白的“职分”。对这些社会政治的、属于法律制裁层面的构想,我认为狄培理应当也相同重视。只是 30 多年了,我还是觉得狄培理先生未免过于美化中国读书人的政治理念了。

今天,我们反思一位哲人的心路历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又具挑战性的经验。显然,狄培理先生早在主持钱宾四讲座的时候已经替自己学术的途径和信念画出清楚的轮廓,但是他却用之后的日子攀攀矻矻地用更深刻的思考来替它们上色,并在教育实践中把它们带进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生命。参与他这一个中西格义,不断深刻反省的礼拜,更是一个充满兴奋和甜美的历程。

(本文原题为“《中国的自由传统》出版 30 年叙感”,发表时有删节。作者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荣休教授)

学人在讲

◆ “不要与贵夫人来往”——古典晚期修道传统及其社会阶级分析

主讲:彭小瑜(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教授)

时间:7月22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 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

主讲:黄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时间:7月23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二层

◆ 困境与破局——思想史向何处去?

主讲:刘禾(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席教授)、王人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时间:7月26日19:00-21:00

地点: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善缘街1号方庭)

◆ 礼乐文化的历史依据与现代价值

主讲:刘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时间:7月28日14:00-16:00

地点:国家典籍博物馆启德厅

◆ 从《乾隆南巡图》看乾隆时期北京的城市生活

主讲:郭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时间:7月29日9:30

地点:首都图书馆A座一层多功能厅

◆ 圣王与圣徒:乾隆时期的密教建筑营建

主讲:陈捷(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

时间:7月30日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 李商隐的感情世界

主讲: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时间:7月30日14:00-16:0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



狄培理与妻子范妮·布雷特